

关于鲁迅所刻的“早”字

●葛涛



鲁迅所刻“早”字真迹照片

绍兴鲁迅纪念馆提供

众所周知,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曾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关于此事,不仅鲁迅夫人许广平提到过,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寿镜吾之子寿洙邻的夫人曾玉堂也说过。

曾玉堂于1951年9月从绍兴移居北京。1962年9月初,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张能耿到北京拜访她,请她谈谈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一些情况。她谈到了鲁迅的“早”字,被张能耿记录在《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用过的那张两斗桌,也是寿家保存下来的。解放初洙邻夫人在绍兴时,她告诉有关人说:“这是鲁迅先生当年念书的时候用过的。”桌子面上右前角刻着的核桃大的那个阴文“早”字,她说:“这个字是当年鲁迅先生亲手刻的。”一九五六年许广平同志来绍兴,到三味书屋参观,陪同的同志说三味书屋已完全恢复了原状。她就拿着手电筒到鲁迅的书桌上去寻那个“早”字。说鲁迅先生告诉他,少年时候在三味书屋读书,每天按时上学。但是有一天迟到了,受到了老师的责备。他就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一辈

“要不折不扣抓落实”“要雷厉风行抓落实”“要求真务实抓落实”“要敢作善为抓落实”。简而言之,就是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要争当实干家、行动派、奋斗者,用实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用实干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实”,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本义是富裕,家里有许多财物,由此引申为名词,指财富;作动词用,指充满。又引申为事实。还指实在、真实,用作形容词。实干,意思是实在的做。与此相关的词语中,“实干兴邦”“实干笃行”“真抓实干”等为人熟知。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是说那些坐着看钓鱼的人,空自有羡慕的心情,指的是空想旁观不如实干。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辉煌成果的取得,靠什么?靠实干。回望过去,是实干使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展望未来,只有靠实干,才能抵达更为光辉的目的地。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是充满光荣梦想,也会有风险挑战的远征,都需要我们都成为踏踏实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

实干为要

●周麟桂

力,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地奋斗,不断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加强学习,提高本领,是干事的基础、成事的保证。当今世界,新情况新技术不断涌现,骄傲自满要不得,固步自封要不得,进步不快同样要不得。因此,要有强烈的“本领不够的危机感”,正视问题、发现不足,加强学习、补齐短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要将学习作为增能力、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始终保持虚怀若谷、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业务学

习,增强干事本领,避免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实干出实效,需要埋头苦干,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真真切切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要有“工匠精神”,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每一项工作,特别是对重要节点、关键环节下一番细功夫、实功夫、笨功夫。要科学筹划,用心干事,适时“跳出来”观察,及时总结利弊,采取有效举措加以提升。

实干,还要讲求格局和情怀。每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行稳致远,都得有一定的格局和情怀。党员干部更要有大局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主动为大局增光添彩。陈云同志当年曾指出,一些干部起初是“干革命”,但随着官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因此,不妨经常扪心自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否做到?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克己奉公,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课桌上所刻的“早”字的拓片,信中说:

×××同志:

今寄上“早”字拓片贰张,其中比较模糊的系原物拓片;另一张为复制拓片,现一道寄去供你挑选。

此致
冬安!

绍兴鲁迅纪念馆资料室

80.11.15

仔细观察信中所附的两张“早”字拓片,可以看出,原物拓片,即模糊的那一张拓片,是从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拓下来的,虽然能辨认出“早”字的大概字形,但是“早”字的上半部分字迹模糊,不易辨认出具体的笔画;而复制拓片,不仅“早”字的字迹清楚,而且刻写的笔迹也比较饱满。对比原物拓片和复制拓片,可以看出,鲁迅所刻的“早”字,字迹带有儿童书写的特点,书法功底不高,而复制拓片中的“早”字,字体圆满,带有一定的书法功底,显然是经过了修饰和美化。

大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绍兴鲁迅纪念馆提供的这张“早”字的复制拓片被一些图书和画册刊用,由此流传开来,以致王锡荣选编的《画者鲁迅》一书,也刊登了这张“早”字的复制拓片。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是鲁迅家购买的,后来被三味书屋的主人寿镜吾的家人保存下来。寿镜吾的家人后来将三味书屋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据悉,鲁迅的这张课桌曾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长期展出过,但是后来因为文物保护的原因,绍兴鲁迅纪念馆在20世纪90年代将这张课桌收入文物库房珍藏,在展览中展出的是这张课桌的复制品。

2024年3月11日,绍兴鲁迅纪念馆响应国家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让藏品“走”出来,让文物“活”起来,将长期珍藏在文物库房中的国家一级文物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搬进展览大厅,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看这一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可以近距离欣赏鲁迅当年在这张课桌上所刻的“早”字原貌,让参观体验更真切也更有价值。

优秀的潮玩产品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品,更是东方意蕴的载体,时代风尚的缩影,人们可以从中触摸历史、品味传统、体会潮流,有利于增进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培厚文化内蕴

丰富文化表达

■我看我说

●常晋

雁翎翅、百花袍,手持方天画戟,坐跨嘶风赤兔马。定睛看,是一款“吕布”机甲潮玩。1000余个零件、2700多道工序,这一潮玩做工精良,屏息凝神间,仿若穿越千年,再现三国古战场场景。

天上人间诸装备,芳园应属大观名。侧耳听,曲声流转、音韵悠长,一套“大观园”拼装八音盒,105片部件融合多种元素,精巧雅致,醉入旋律中,红楼一梦,如在眼前。

国潮兴起,潮玩火热。据估算,2023年,我国潮玩市场规模约达570亿元,预计2026年将扩大至1101亿元,2022—2026年间行业复合平均增长率可达24%。从小众文化到大众市场,从舶来品到原创出海,我国潮玩产业突飞猛进,发展之盛,令人瞩目。

消费潜力优势和供应链优势,构筑起发展的基石。消费侧,伴随社会生活水平提高,情感型精神消费快速增长。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不仅关注“实用国货”,还青睐“品质国潮”。潮玩产业发展恰逢其时、市场广阔。供给端,我国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潮玩产品质量更稳定、设计更新颖、造型更多样,不仅满足了娱乐、个性化表达的多元需求,也成为社交互动的新媒介。

潮玩热既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积淀数千载并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为潮玩创新创造提供丰厚滋养。细赏一件件匠心独运的文创潮玩产品,或和传统融合,醒狮手办展南派舞狮之雄姿、千角灯立体拼图呈现花灯彩之瑰丽;或同时代相适,冰墩墩萌动可爱畅销全球、盲盒玩偶创新形式广受欢迎……优秀的潮玩产品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品,更是东方意蕴的载体、时代风尚的缩影,人们可以从中学历史、品味传统、体会潮流,有利于增进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潮玩惊艳破圈,得益于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也反过来增进了这种自觉与自信。可以说,潮玩之“潮”,是国货之潮,也是文化之潮。如今,潮玩产品不仅“圈粉”国内消费者,还走红海外,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当一件件浸润着中式建筑精妙与匠心的精研玩具在海外大受欢迎,当结合了金翅鸟冠、万工花轿、凤凰等各式中国传统元素的3D金属拼图玩具闪耀国际展会,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的中国,也逐渐铺展在世界面前。

让潮玩更“潮”,丰富文化表达和创新玩法是重点。文化是内核,潮玩设计不能仅靠复古怀旧或符号堆叠,学其形更要追其神。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形、意、境等不同层面将物品功能、视觉形象等创意组合起来,才能使产品有“面子”更有“里子”。可玩性是关键,不妨兼顾收藏观赏与互动体验。比如,可以结合AR技术,打造虚实结合场景,开展智能交互,增强沉浸感;也可嵌入芯片,开发配套手机应用,实现动作感应和语音识别,提升参与度。培厚“潮”的内涵,丰富“玩”的外延,潮玩产业方能不断焕新,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文贯千年,潮涌东方。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并相信,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深厚的中式美学精神,会成为更多行业创新发展的灵感来源。澎湃不息的国潮,将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光彩。

中华五千年从何而来

●彭小军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所耳熟能详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何以“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

溯源

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最早出处,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最早出自17世纪意大利人卫匡国。他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十卷),首卷介绍远古中国神话,从伏羲开始叙述三皇五帝,且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定为公元前2952年,从而奠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框架。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与黄帝纪元有关。宋代邵雍撰写的《皇极经世》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即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据晋书《帝王世纪》计算,尧上推五帝,历时341年方为黄帝,故清代考据学家认为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清末民初,内忧外患,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黄帝元年也随之被视为中华之起始。

以三皇五帝作为中华之起始的看法由来已久,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共识。据学者梳理,早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便写道:“这位黄帝是伟大的占星家和发明家,创造了现代中国文明应有的一切。”黑格尔在他的权威著作《历史哲学》中提出,中国的“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可见,在19世纪以前,欧洲历史学界基本认同三皇五帝是中华古史的开端。

19世纪中叶开始,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等唯物论学说在欧洲深入人心。历史学受到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逐渐走向科学,以传说作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开始受到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带着科学救国的精神,开始反思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其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

传统古史体系展开热烈讨论,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点,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人提及禹,孔子提到尧舜,战国时开始谈及黄帝、神农,汉代又加上盘古。由此,曾经被奉为圭臬的“三皇五帝”体系开始崩塌,成为古史的“传说时代”。

求索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古,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考古,1930年山东章丘城子崖考古……通过考古学寻根问祖,以地下出土实物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肩负的最大学术目标。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通过考古学去证明之前依靠历史文献而建立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并非坦途。

同时,在传统古史体系被打破的前提下,考古学要回答“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自身的年代框架和话语体系,明确“文明”是什么?“文明”在考古学上有什么表现?1939年,梁思永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龙山文化被冠以“文明”的史前期,意味着还不是文明阶段。1957年,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明确将安阳殷墟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在此,两位先生使用的“文明”,大概与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阶段有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尤其是红山、良渚、大汶口、仰韶等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多位学者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进入“原始文明”“远古文明”“文明时代”。

1983年3月,夏鼐先生讲演《中国文明的起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6号墓出土的透雕玉冠状器。

新华社发

源》,相关内容之后公开发表。他从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指出文明是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换言之,“是否进入国家阶段”是判断文明的重要标志。

几乎在同一时期,苏秉琦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问题,指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号召“我们要去研究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起源”。

在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中,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国—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形式(裂变、碰撞、融合)等重要理论,进而指出中华文明犹如漫天星斗,多地起源。

严文明先生进一步提出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距今5500年至46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明晚期、大汶口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晚期—屈家岭文化等,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率先进入了走向文明步伐;距今46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文明化程度又提

高了一步,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可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始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两方面的重要认识:一方面,不再局限于文明起始、文明要素的判断,而是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文明起源不是一地发生的,而是多元的。这为下一阶段的大规模研究与论证奠定了理论前提。

实证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继而动态描述国家起源、王权出现的过程和社会各方面样态。

通过全方位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归纳为:距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研究表明,大约距今5800年,中华大地黄河

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中心聚落,周边有附属聚落拱卫。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南澧县城头山、江苏张家港东山村、辽宁朝阳牛河梁不仅聚落面积庞大,有的中心聚落还修筑城池,出现了高等级的仪式中心。

同时,中心聚落拥有较高的陶器、石器、玉器制作水平,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显示出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分化。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一个墓葬中就随葬300多件器物,仅玉器就有上百件,还有权杖、钺等重要的权力标识物,说明社会分化已经出现。这种一座以大型聚落为中心、多座普通村落附属的社会结构在各地普遍存在,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华大地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距今5300年,古国不断发展,形成更为复杂的文明形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不仅修建了相当于4座故宫大小的古城,还建设了更大规模的外城。城的中心,有高大巍峨的莫角山宫殿区、国家粮仓,古城内遍布水路、水门、码头等。为了维持古城日常用水、防洪、运输等功能,良渚人设计了发达的水利系统,可影响上百平方公里的灌溉面积。

在离古城不远的茅山、施否等遗址,考古揭示了数万平方米的水稻田遗迹,阡陌纵横交错,水渠四通八达。伴随发达的稻作农业,玉器、漆器等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反山、瑶山等“王陵”与一般墓葬形成明显对比,显示出贫富贵贱的分化与悬殊,阶级开始出现。这些现象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区域性政体。

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修建了大小近20座古城。每座城都有自己的附属聚落和领地范围,同样规划修建了复杂的水利设施,集中力量发展稻作农业。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形成了多个大型中心聚落。每一座中心聚落都有复杂的防御设施,“宫殿区”,并且能生产出丝绸等高端工业品。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焦家、岗上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表明存在复杂的社会结构、聚落形态和礼仪制度,尤其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等。

尽管各地的考古资料在具体形式上存在区别,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政治实践、文明模式略有不同,但人口集中、社会分化、手工业分工、权力信仰却表现出同质现象,都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王权、国家已经出现。

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距今5000多年前,各地的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最根本标志”,那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确非虚言。